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8.06.014

身份认同·英雄血统·史诗架构

——刘萧《筭军之城》小说艺术论

冉 华

(西南政法大学 全球新闻与传播学院,重庆 401120)

[摘 要]刘萧的长篇小说《筭军之城》,究其内部属性而言,实为当代文学制度规约下的宏大题材小说,其以浓厚的女性自我意识、家族观念和边地风情为写作基础,写就了超越的族裔认同、国族想象,并意图获得一种超越的文化认同;在叙事技巧层面,小说以替补与重复的方式塑造英雄,在母性情怀与男子气概之间寻求平衡,以此建构了筭军的英雄血统,进一步丰富了湘西世界的“边地”内涵。

[关键词]刘萧;《筭军之城》;身份认同;英雄血统;史诗架构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8)06-0079-05

Identity, Heroic Descent and Epic Structure: On the Fiction Art of Liu Xiao's *The City of the Gan Army*

RAN Hua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 *The City of the Gan Army* is a novel written by Liu Xiao. In terms of its internal properties, it's actually a novel with macro themes under the stipulations of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system. Based on the richness of female self-consciousness, family values and regional custom, it describes the transcending ethnic identity, the national imagination, and the intention of acquiring a kind of transcendental cultural identity. When it comes to narrative techniques, the novel shapes the hero in a substitute and repetitive way and try to seek a balance between maternal feelings and manliness. On account of that, the novel constructs the heroic lineage of the Gan Army, which further enriches the “land” connotation of the Xiangxi world.

Key words: Liu Xiao; *The City of the Gan Army*; identity; heroic descent; epic structure

湖南凤凰籍苗族女性作家刘萧的长篇小说《筭军之城》,2014 年 6 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该小说系还原和陈述镇筭(湘西凤凰)近代史以及梳理筭军英雄谱系的精心之作。小说出版后,被《长篇小说选刊》选中刊载,同时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了《筭军之城》研讨会,产生广泛的影响。2015 年 5

月,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入围名单揭晓,《筭军之城》作为 252 部长篇小说之一成功入选。刘萧是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忧郁村落》、长篇纪实文学《挺进美利坚》,其代表作主要有短篇小说《河的儿子》《乡嫁》等。以下笔者拟从内在属性与叙事策略角度对《筭军之城》的艺术价值进行

收稿日期:2018-07-22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传播伦理建构与社会文化实践问题研究”(2017YBCB065)

作者简介:冉 华(1986-),男,重庆酉阳人,西南政法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文艺与文化传播学。

探析。

一 文学制度与“少数民族女性作家”身份认同

论述之初,有必要从文学制度层面关注小说家的“少数民族女性作家”身份。饶龙隼教授在《中国文学制度论》一文中指出:“文学制度,就是文学活动的节,出自中国文学制度的观念,文学活动实质上就是节文,亦即节以制度而修饰以文。”“文学制度有三大论题:(一)文学节止论,(二)文学节度论,(三)文学节制论,分别讲述节文的原则、节文的内涵、节文之操持,即为什么节文、什么是节文、如何来节文。”^[1]通行的看法则将“文学制度”理解为“文学与社会、作家与读者、文学与生产、评价与接受”形成的综合体制。^[2]同时它也被认为是现代文学的生产场所和内部运行机制的总称。于此,我们认为“制度”作为一种“自身规定性”力量而客观存在,其本身具有体系性的结构,在当代文学的发展演化过程中时常起到开发被遮蔽空间、敞明阴影部分的功用。文学制度从宏观层面特别关注“少数民族女性作家”这一多重弱势群体,以确证少数民族的创作身份,增进国内各民族的文化认同,进而促进少数民族女性小说创作的繁荣。

制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延伸与权力的分配图景,给予了女性作家相当程度的宽容、支持与理解。也许正是得益于制度上给予的身份肯定以及敞明阴影的现实效用,女性作家才敢于进行湘西军事题材小说创作。文学制度给小说家以话语权力,也让拘囿于凤凰的作家敢于尝试宏大叙事,开启基于近代史的超越的国族想象。从结构来看,《筭军之城》存在着两个断裂的部分,前部分虚写其无,述其家族统绪,勾勒家族历史;后半部分,小说家保持了应有的拘谨和克制,忠实于史料,大多据实而写。可以说,这部描绘筭军历史的小说,实质上成为了凤凰人关于近代史发展历程的一种自我陈述。湘西作家田耳正是从这样的角度指明刘萧的写作倾向,“《筭军之城》也有这样的趋向:你记不住它的情节,但你能闻见字里行间扑面而来的湘西气味,并以此理解湘西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他们处理问题时乍看不讲理,再一回味又自有一套蛮荒法则支撑的态度。”^{[3]72}其实,就算这种“蛮荒法则”,也仍在当代文学制度的许可范围内。此处所要说明的即是,当代文学制度的容纳空间与弹性尺度,

给予了当代作家一定的舒适感受。

其次,族裔认同在作家的创作意识中常呈现出拉锯战的心理状态。《筭军之城》生动地展现了苗汉、满汉的民族冲突,中国与日本等外敌的国族之争,显示了从族际冲突到超越“边城”的国族想象演变的整个心路历程。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内心充满了拉扯和纠结,而这种挣扎也具体地呈现在作品中,丰富了小说的内涵,增强了小说的感染力。在虚写的前半部分,小说讲述的是清军与当地苗族英雄·乜之间的对战,作家的态度显得暧昧不清。最终结果是两个仇家结亲,去恨和好,归化于湘西历史统绪。虽然话语里充满了苦涩,但对那段阵痛的历史,作家多采取模糊的态度。涉及到太平军等“外部势力”,筭军往往以满清王朝作为国家正统。他们作为“清军”的一部分,征战于川、黔、藏各地,尽的是保民固土的责任。这一层面,作为汉人,他们正面应对了满族的权力统治,行使“军人”职权,以求保家卫国。随着时序推演,辛亥革命后直至抗日战争时期,作家流露出了虚化的种族感与遮蔽的历史感。匡嘎一琼三兄弟出场,特别是匡嘎惹巴带领一二八师在上海等地对日的浴血奋战,又牵引出了作家别样的心态。小说客观描写了筭军在国民党军队序列里的地位。尽管筭军浴血奋战,却得不到肯定,还经常受到排挤,“杂牌军”和“地方乡勇”等称谓也说明了其在国家视野中的边缘生存境况。小说家缘情而发,痛心疾首,不免将正面抗敌的筭军部队视为“我军”。此时的“我”,不再是融入湘西部族、筭军血液的“我”,也不是彼时统治者阵营中正统的“我”,而是一种超越的情感体验中的“我”。“他者”与主体“我”的融合,充分展示了作家和小说本有的国族想象。其中暗含了超越族裔的认同感,视角也不再简单地以湘西部族作为中心了。

于是,镇筭不再是受限于沈从文先生框定的“边地”概念,而湘西也不再是受限制的孤立中心。它恢复到一种传统——可以建构的正统。投笔从戎的武人精神成为一种代表文化,血脉喷张的“不战则死,不死则战”的基本印象得以确定。超越的国族想象和族裔认同成为可能,作家也放下了她地域性的种族意识,超越性的史诗创作有了它得以产生的契机。缘于此,评论家阎晶明对女性作家挑战军事题材的小说创作感到惊奇。^[4]而正是女性作家,才以母性情怀消解了军事斗争的残酷,以审美

方式弥补了湘西地方文化性格的缺陷,而“刚直不阿与火爆直露的性格,是武人的必备,但对于政治来说,则是缺陷”^[5]。《箴军之城》在当年入围“茅盾文学奖”的初选大名单,得益于湖南省作协的推荐;入选国家级评奖,可能获得“颁奖制度”的正面肯定则说明实体的文学制度和文学制度化过程的确为少数民族的族裔认同、超越的现代文化认同提供了契机与可能。当然,文学制度作为文学自身的规定性,也容易给部分创作者带来紧张感,焦虑反映到创作中,便会滋生出另外一些新的问题。

二 移出与补入:英雄血统叙事与文化记忆空间

文学制度给予文学写作一种当代有效性,却很难规约它的无序性。那些脱序的历史,跳脱历史的写作常常出现在文学创作中。文学制度自身的规定性力量,也可能限制文学创作的延展空间。既然空间已经确定,就不再有任何扩张的可能。作家所面对的,一面为现实世界,一面为理想世界,两者之间,作家便要做进一步的筛选处理工作。德里达说过:“它是对代替进行补充。它介入或潜在替代性;它在进行填补时仿佛在填补真空。它通过在场的原有欠缺进行描述和临摹。替补既是补充又是替代,它是一种附属物,是进行代替的从属例证。”^[6]一般来说,文学的创作空间是饱和的,文学想象空间也是基本固定的,每当一个人物和事件想挤进现存的文学空间,就要消耗文学创作的部分力量,也就意味着另一个的退出。也就是说,处于叙事序列中的一个人要退出,也就意味着另一个人(或事)必将进入,当然,后者是以前者的补充部分而出现。在《箴军之城》中,在匡嘎米谷、匡嘎沃金、匡嘎恩其以及匡嘎一琼三兄弟形成的四代家族代际序列中,真的“匡嘎恩其”本是兄长,然而她随母亲在秦镜面前一起死去。他的弟弟匡嘎癩子作为其“替代者”,不仅沿用其名,更是以匡嘎恩其之名继承了匡家的血统,而且扬名立万、光宗耀祖,承续了匡嘎恩其应有的使命。兄长恩其长相漂亮、知书达理,走的是文士才人的路子。然而,在古老的湘西世界,好勇斗狠的勇武精神才是正统。这种读书取仕的路子多半行不通,就算行得通,大多也不容易被认可。在小说行文中,我们也常看到长子容易早夭、幼子却容易有出息的情况。由此可见,湘西世界的亲缘伦理,重心是向下移动的。思想精神每每由文向武

倾斜,随着生命的延续,地域精神自然而然地得到承传,文化记忆也层累叠加。不过,有的学者也由此认为刘萧的叙事不合逻辑,认为这是作家略有疏漏的部分,“本来,我非常佩服她把陈渠珍、顾家齐和龙云飞这三个来自不同家庭的历史真实人物的故事,作为匡嘎一琼、匡嘎惹巴和匡嘎云飞三胞胎融为一家和一体,但是,她写着写着,就把这三胞胎完全剥离开来,又成了陈渠珍、顾家齐和龙云飞各自独立和不相干的人物在交集,而不是血脉相连的三胞胎的交集。历史上,这三个人物是紧密交集但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刘萧把这个三个紧密交集的人物原型捏合成一个三胞胎后,一起度过了童年少年,但是,当这三个一母所生的三胞胎分开又同在一起相见和并肩作战后,居然三人都互不相识,没有任何兄弟之间的情意书写和交代,就像三个完全陌生的人走到一起一样。这是完全不符合生活逻辑和情感逻辑的。”^[7]不过,我们细读文本就清楚,只有匡嘎一琼失败,匡嘎惹巴才能带箴军出征;又只有匡嘎一琼败落,匡嘎云飞才能出面活跃,搅动湘西。历史的结局是二人都败落,苦心经营的兄长匡嘎一琼谋杀了匡嘎惹巴,重新坐镇湘西。这样的一进一退,一出一入,足以说明湘西的空间只有这么大,箴军只有一支,独领风骚的湘西英雄只有一个,但他们血缘谱系一致,命运又总高度统一。不过,就算如此高度统一的命运,仍难逃脱整体的命运悲剧。其实,也正是这样的进退出入,突出了箴军血气之重、精神之强,以及难以避免的命运之悲。这也就是刘萧着力要描写的箴军英雄谱系和湘西历史命运的整体之悲。

伦理重心向下移,历史感得以延续,这便于作家切入重点,所以移出与补入作为叙事的基本手段,被作家反复使用。这种父子伦理,作为生命的延伸,不惟出现在匡嘎家,在田兴恕与廖嘎宗顺等不同阶层的家族中——家业相传,父子之间,都如此延续。基于文学制度拓展的开放空间,作家创作了大量的英雄人物,也仿写了不少历史人物。这些历史人物不以单个面目出现,而是群相即立,近代历史上的箴军英雄系统也同时建成。熟悉湘西历史和刘萧的评论家指出小说中的原型,“比如英雄·乜的原型,就是湘西苗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吴八月。匡嘎一琼的原型,就是湘西王陈渠珍。匡嘎惹巴的原型就是128师抗日英雄顾家齐师长,而匡嘎云飞的原型,就是湘西有名的土匪

王龙云飞”^[7]。而田兴恕、田应诏、戴季韬、沈岳荃等,在历史上本有其人。真实与虚假之间,相互协调,混沌之间,互相补充,算军的历史得以书写完成。果雄·乜首领生不畏死,其所统领的民众自不会苟且偷生。身居高位的提督田老官更可慷慨赴死,从容不屈,大喊,“吾乃算军将领,视死如归,怕你个卵!尔等不杀,爷爷老子明天提着你首级熏腊人头!”镇算之军,浴血奋战,以“卫国为荣”,宣称“不战则死,不死则战”。

三 母性体验、女子部族与“边地”史诗架构

刘萧始终以女性视角来精心建构和营造着边地世界。文学制度给予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合法性,也给予地域文化想象空间。刘萧在边地文化的写作中突出地域性的文化背景,但是也强调本土文化建构的合度原则,其中隐含着一种超越的正统观念。因此,边地独特的文化兴味得到了明确的标注,它的具体表现一是边地的人物,一是边地的风物。

从人物来说,其主要体现在以“莫歌”的视角切入并据此形成的女性部族。缘此继续刨根究底,则可发现小说独特的女性意识。对于作家来说,这是忍痛创作,所谓含血泪而歌。“2006年,我剖腹产下一个儿子,却因为早产,儿子仅存活一天就夭亡了,他留给我的只是一个叫‘匡嘎惹巴’的名字,以及低低地像呼唤‘妈妈’一样的哭泣声。取这样的名字是因为随父姓匡,后面几个字为土家族语,意为某家最漂亮的小伙子。”她饱受丧子之痛,先写成小说的最后两章,“这种感受,就是自己当时生活的感受,主人公莫歌是对自己的一种想象,儿子匡嘎惹巴是想象中他应有的命运结局或者说生命的轨迹。这种想象对于我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在我生长的镇算(即现在的凤凰),这样英勇活着英勇死去的男人太多,对于这样的男人,我一向倾慕而崇拜。”^[8]她处在痛楚之后的失语状态,所说的尽是体己的私房话。她常常以歌来表达自己独特的情绪体验。此时,莫歌是她,她是莫歌。其絮叨之语,却显得那么刻骨铭心。小说家以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独特的身份来讲述故事,以自己切身的经验切入“莫歌”的叙述程式,灵魂便得以合二为一。“只道一点:她将主要人物尽皆归入匡氏家族,这就掩不住她对其夫匡先生深挚的情意。小说写的是本土,刘萧女士又曾参与陈渠珍作品的注释工作,

熟知地方史料。我读小说时,就能感受到她头脑中虚实相生若在其中的美好状态。”^{[3]72}小说因此流露出浓郁的家族意识。小说家也以女性的切身经验,将女性人物整体展示,进而集合而成一个混同的女性部族。比如莫歌(匡嘎沃银)的祖母菊在,姑母匡嘎沃金、阿原错,丫鬟黛帕等等,这些女性个性突出,能够在镇算相夫教子,真心相爱,服从命运的安排。而陇嘎那朵、小红钱等奇女子们,以别致的形象形成一个集合想象,通过小说的叙事主角莫歌将她们串联起来,绘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正是女性的坚韧,女性对男性的崇拜和维护,情投意合的男女,互相激励的情感,最终展露出边地气质,也完善了边地文化的想象。

补充边地特色的除了群相中的英雄个体之外,更有对僧、道、俗等人物形象的精心塑造。湘西世界是一个巫文化氛围颇为浓厚的地区,在小说家受到的文化影响里,儒释道必不可少,其笔下的人物形象因此变得立体多面。比如陈法阳明显是道家做派,那颇懂风水的廖嘎宗顺父子也多近于道,在杭州灵隐寺的禅坐老者明显是禅师的代表。对于乱离之世的人们来说,佛门是清静之地,道德能帮助人延续理想性命,能给混沌中生活的边地人们带来安慰。除此而外,叫花子、乞丐、石匠等也是日常所见的人物。也正是这些僧道俗众,他们的人格想象和话语表达真正彰显了湘西的边地独特风情。镇江战太平天国军,凤凰算军以弱敌强,近三千子弟异乡埋骨。如鸟鸣山间,英雄咳血,灵魂难安;“僧、道、俗”者往往能够作为一种特别的力量存在,只为招魂引安。

另外,从小说技法来看,《算军之城》前半部分虚写,后半部分据实而写;小说的叙述节奏显得很快,让读者有一种赶不上感觉。以前太过悠长的历史、厚重的文化记忆,小说家处理起来难免紧张。从文学语言上看,作家刘萧善于用成语、用排比句来彰显英雄人物的气势,这其实也是为了缓解其内在的心理压力。毕竟宏大叙事与史诗建构对于小说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充满感情力量的诗语言,增强了小说的叙述气势,而诗的跳跃节奏,往往因内心紧张而中断,一节一节的,也一如那边地的风情。“就像沱江,拐过一个山弯后,又呈现出它的波涛汹涌和碧绿绵长。”谱系血统,历史渊源,“像一种召唤和牵引,使人的回忆像家乡的沱江一样难以斩断,又如亲人的目光一样可以洞穿”。不过,这

种诗意写作的方式容易引来质疑,但那充满阵痛感、正在忧愤中的作家,惟有如此写作,她那澎湃的感情与创作的紧张感才能真正释放出来。

事实上,饱受伤痛、内心悸动的作家,又因族裔认同本有的拉扯和撕裂,面对如此宏大的题材,写作难免受到限制,而创作也成其为内心的释放过程,于怀岸将此总结为“以回望的姿态写作自己的小说”^[9]。因为这种发愤著书的意识和不平则鸣的情感,刘萧也以此塑造文化记忆。对应到那充满血泪的箐军血统,小说显得诗意盎然、内涵丰盈。不过,作者对题材的处理稍微不好便会损伤小说的应有品格,湘西本土有些作家显然认为刘萧女士的写作太过绵软。“缺乏硬桥硬马拳拳到肉的功力,也没有逢山打洞遇水架桥的狠劲。它随意任性,恣肆妄为;它气脉通畅,意绪昂扬,像醉酒的土老司扔开唱本打卦,即兴发挥,到哪算哪,自己酣畅,听者淋漓。回头一想,说的什么,道了哪些,都无需在意。”“最大的问题在于全文前后部分的断裂,前半部分写虚,极尽想象之能事,后半部分忽然夯实,步步紧贴史料。后半部分大抵以陈渠珍史事为底本,材料过多,刘萧女士没有太多发挥,而前半部分大多取材于零碎的口头资料街谈巷议,加以发挥,反而得来奇观之效。前后不通畅,全文就没法成为浑然整体。”^{[3]72}事实上,如果我们抱以理解之同情,不去计较其中缺乏气力的部分,不过于挑剔其无法对应的国族想象,不执拗于女性写作的“女子部族意识”,那么,小说中的虚写与实写其实是相得益彰的,小说自然也无可挑剔了。

总结以上,究内部属性而言,此类宏大题材的小说创作,是在当代文学制度规范和框定下的小说创作。小说以浓厚的女性自我意识、家族观念和边地风情作为写作基础,进而写就了超越的族裔认同、国族想象并意图获得一种超越的文化认同。在其叙事技巧层面,小说以替补与重复的方式塑造英

雄,在母性情怀与男子气概之间寻求平衡,以此建构了具有整体感的箐军英雄血统,也进一步丰富了湘西世界的“边地”内涵。但因为女性在阵痛中难以节制,在宏大的历史文化面前感觉紧张,在族裔认同的拉扯战中无法对应到合理的国族想象;这样,“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将个体之悲、女性之悲、家族之悲、在地文化之悲、国族想象之悲、现代性进程之悲融成一体时,难免情绪混杂、意识混乱,难于厘清其中复杂关系,其浓烈的悲剧体验、混杂的情绪因素冲淡了应有的文化认同感受,这项史诗创作的工程,因而存在不小的遗憾,这也是许多关心这部小说的读者不满足的地方。

参考文献:

- [1] 饶龙隼. 中国文学制度论[J]. 文学评论, 2010(4): 4-17.
- [2] 王本朝. 文学制度与文学的现代性[J]. 湖北大学学报, 2003, 30(6): 53.
- [3] 田 耳. 我读《箐军之城》[J]. 文化与传播, 2015, 5(6): 72.
- [4] 佚名. 湘西女作家刘萧长篇小说《箐军之城》书写“新凤凰传奇”[EB/OL]. [2014-11-07]. <http://yk.01ny.cn/jknews/a/20150306/1832.html>.
- [5] 何小平. 论苗族作家刘萧小说《箐军之城》的悲剧审美意蕴[J]. 民族文学研究, 2016, 34(2): 102.
- [6] 雅克·德里达: 论文字学[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211.
- [7] 彭学明. 看凤凰怎样涅槃: 评刘萧长篇小说《箐军之城》[EB/OL]. [2015-04-27]. <http://www.frguo.com/Info.aspx?ModelId=1&Id=13738>.
- [8] 刘 萧. 关于《箐军之城》的写作[EB/OL]. [2015-06-12]. <http://news.hexun.com/2015-06-12/176677148.html>.
- [9] 于怀岸. 以回望的姿态写作自己的小说[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22(5): 1.

责任编辑: 黄声波